布尔什维克

第6期 2026.07

革命与女性解放：中国性别问题



Большевик



目录

《布尔什维克》第六期||2026.07

1.社论

革命与女性解放：中国性别问题

2.深度分析

中国性别战争

身份政治的破产

3.理论

家务劳动是“无偿工作”吗？：错误的理论前提导致实践中的反动立场

封面：1950年3月8日，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正在驾驶从大连前往旅顺的蒸汽火车。
本页：新中国的第三批女飞行员之一洪连珍与飞机合影。

本刊网站！

https://bolshevik.red/

月报订阅！

发送任意内容邮件至如下地址

bolsheviks.sub@proton.me

即可订阅！安全起见请勿使用国内邮箱

我们是谁？

《布尔什维克》杂志立志成为一份真正属于劳苦大众、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报纸——也就是读者你的报纸！我们的各个专栏将专注于中国现状的方方面面。如果你对当下的社会不满，欢迎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老板做了什么糟糕的事情，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了生活面临的困难，以及你的同事同学和朋友们怎么想。更重要的是，请你也帮助我们来建设这份《布尔什维克》杂志，为建设一个革命党出一分力，请投稿，订阅我们的报纸，并给你的同事和同学朋友们看看这份报纸吧！推特：@bolshevik_red投稿：bolsheviks.red@proton.me



本页图片：自制

革命与女性解放

中国性别问题

Revolu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Issues in China

原创 || 作者：喀秋莎

中国的青年人正在大范围的激进化，这正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要去优先赢得的阵地。

但青年人激进的方向也是有差异的。粗糙概况的话，男性青少年大多会直接从马恩列斯毛的方向起步探索，即所谓的“左圈”。但女性青少年却更警惕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保守性别观念。

激进女性无法绕开性别压迫问题：就业歧视，同工同酬，产假权，家务劳动，催婚催育，性别歧视、性骚扰和性犯罪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她们会严肃考察左派的性别立场。但辩证的是，她们一旦被说服就很容易直接靠近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例如，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部分毛主义女性激进青年，她们多持革命立场，是毛派中最激进的力量之一。她们目前选择毛主义，实质是支持带来巨大阶级和性别解放的 1949 年无产阶级革命。

过去的中国互联网女权运动就已经证明，性别解放议题蕴含的巨大阶级斗争潜力。如今，身份政治运动在中国衰落，资本主义危机继续加深。一面是青年人持阶级立场的广泛激进化，一面是经年来未曾止息的性别战争，例如彩礼、婚育等问题。

这都是危机的产物，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

中国女性解放问题背后，一是就业和劳动权益的问题；二是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它直指住房、育儿、养老、照护、家务劳动等工人阶级再生产自身的需求；三是教育社会和惩处犯罪的问题，它要求工人阶级拥相应的物质和政治杠杆。一句话，中国女性解放问题，就是工人阶级要掌管、改造社会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因此，必须***辩证而非机械地***用阶级方法分析性别问题并提出解放纲领。这种力量不容小觑。处理它需要阶级的方法论和分寸感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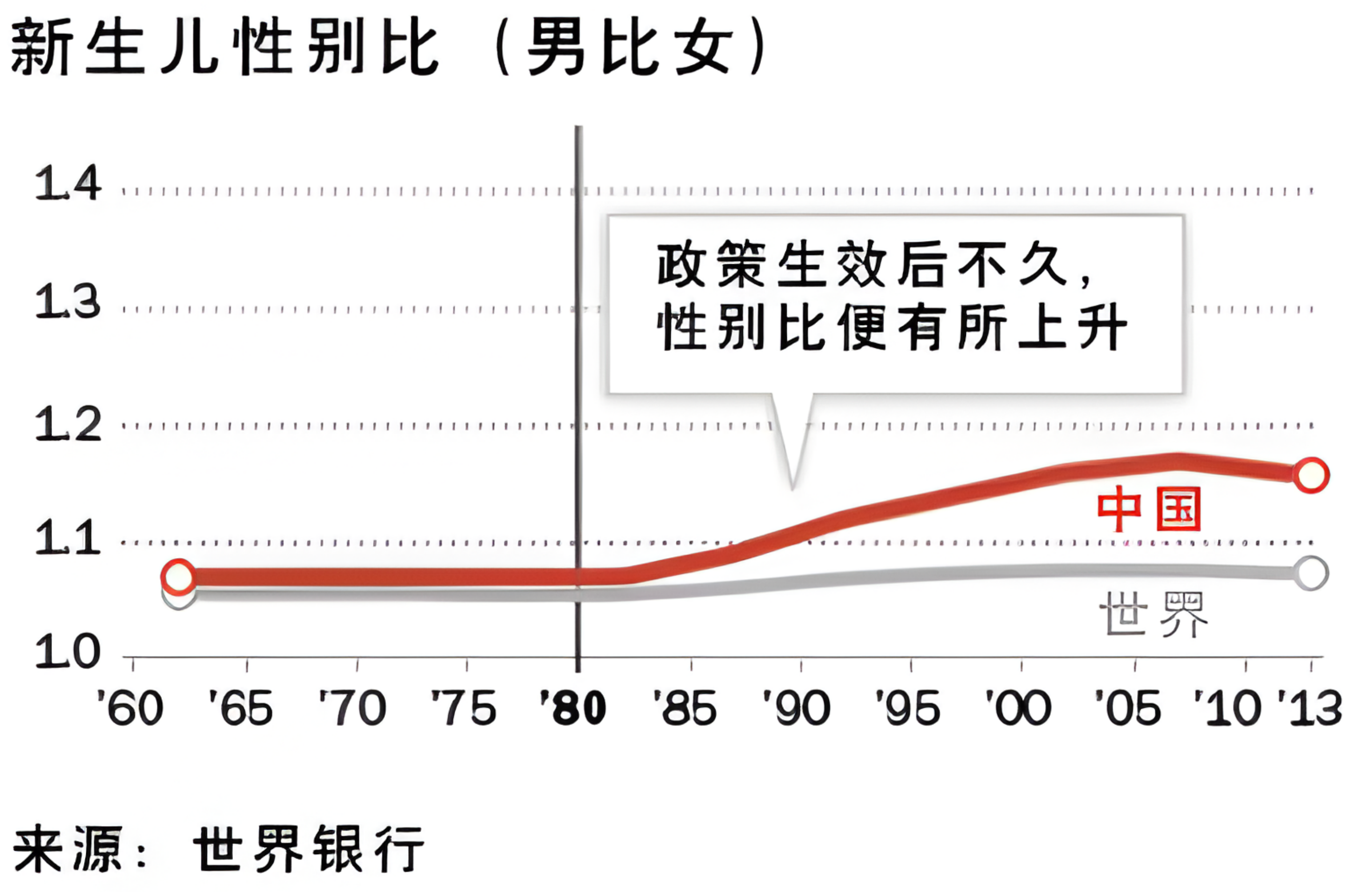
1. 切入：彩礼问题

那么怎么用阶级方法有分寸感地分析？这里以当今最尖锐的彩礼问题为切入点。

首当其冲的是天价彩礼问题。根据一篇 2021 年的国内论文，[1] “天价彩礼”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集中出现自约 2011 年，并在 2016 年后加剧，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多个省份。天价彩礼是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农业地区最近十几年激烈的婚配竞争？首先是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是过去严重的婴儿性别筛选和今日农村女性流入城镇。

畸形工人国家时期，官僚控制下计划经济未能发挥出其潜力。这首先导致广大的农村未能被工业化城镇化。1978 年中国资本主义改恶前，82% 的人口在农村。虽然生育实践上农村因为土地政策溺死女婴的现象锐减，但那里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未能被根除。



在 80 年代前，尽管也有推进计划生育，但中国工人国家的婴儿性别比基本正常。
//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其次，计划经济受阻使得实际生产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官僚基于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将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因而严格控制生育。但真正的转折点是一胎政策，它倒逼农村加剧性别筛选。在 80 年代前，尽管也有推进计划生育，但中国工人国家的婴儿性别比基本正常。[2] 从 1979 年到 2010 年极其严格的一胎政策年代，加之以包产到户的土地实际私有化改恶，农村婴儿性别选择不降反升：如果只能生一个，最好是男孩。正常新生人口性别比为 102-105。1979 年之后的中国一直超过 107。2020 年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20~24 岁、25~29 岁这两个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均超过了 120”。

按天价彩礼刚兴现的 2011 年算起，一胎政策下的农村婴儿最大的也仅为 31 岁，正值适婚年龄。而若是从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的最后一年 2010 年起算，这批一胎农村婴儿最小的也仍有 16 岁，他们接下来的十来年的时间也要恋爱和寻找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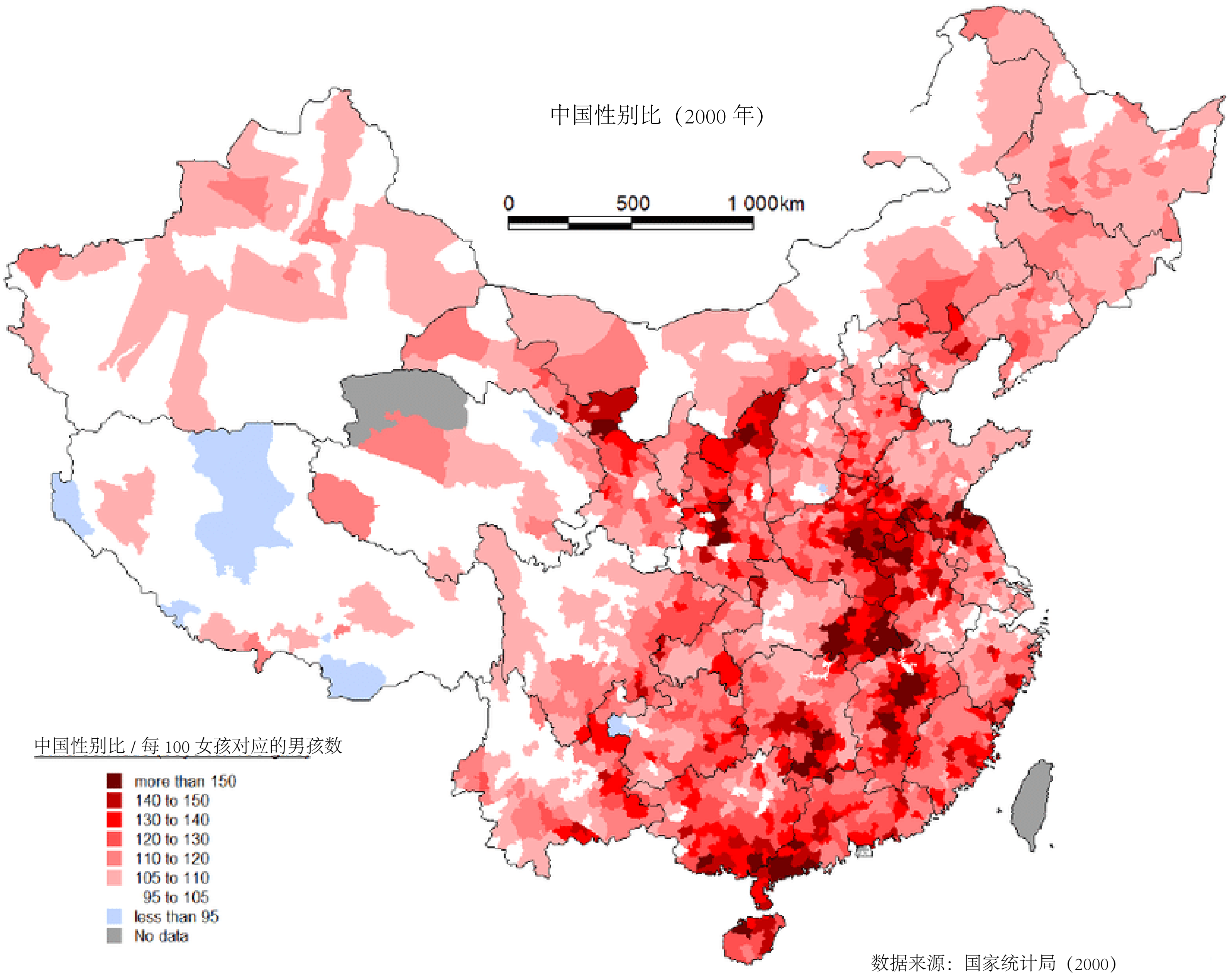
另外，资本主义改恶后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这也给农村女性带来了机会逃离闭塞落后的山区和乡村。如果有机会，她们会倾向留在城镇。[3] 以贵州为例，根据 2021 年贵州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省流动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4] 在全国范围内，女性就业流动速度也远大于男性。[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女性单纯通过婚姻留在城市的概率并不高。[6] 进城务工的女性中，仅有 15.7% 与在外结结识的异乡人通婚。[7] 其中对方为本地户口的又少之又少。流动人口中超过 90% 的初婚都是双方均来自外地，仅有 3.6% 为本地男外地女的结合。[8] 但无论如何，女性逃离乡村也加剧了农村本地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

再者，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不分性别地全部地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工人阶级在大城市恋爱、驻扎和婚育都十

分困难。而对低薪高工时的农村进城工人尤其如此，流动人口中的80% 在物价高昂的大中城市。无论是房价、生活成本、还是阻碍他们子女接受城市教育的户籍制度，都迫使流动人口返回家乡处理婚育问题。

而由于在外打工收入微薄，农村家庭仍旧是很多年轻一代的重要经济支柱，这使得家长得以主导婚配。加之回乡时间短，相亲就成了促成农村适龄青年男女婚嫁的主要渠道，这也催生出了闪婚和随之而来的高离婚率。贫穷和缺少个人时间，在进城务工的青年男女身上几乎扼杀掉了自由恋爱的可能。

男多女少的相亲竞争中，市场的逻辑代替掉爱情的逻辑，价高者得的道理赤裸裸地演变为农村的天价彩礼。有些彩礼等同于农村家庭 20 年的总收入。这背后更涉及资本主义下乡村财富分化加剧，富有一层用高价彩礼获得婚配机会，中层不得不跟进，而贫苦的下层更加不被



“天价彩礼”集中出现自约 2011 年，并在 2016 年后加剧，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多个省份。// 图片来源： Guilmoto, Christophe & Oliveau, Sébastien. (2007). Sex Ratio Imbalances Among Children At Micro-Level: China And India Compared..

青睐。根据另一项 2023 年的调查，陕西已婚城乡青年中 80.25% 都曾因婚借贷。[9]

天价彩礼也重新加剧了对农村女性的物化甚至商品化。许多农村家庭不顾女儿婚后处境，将女儿“高价”嫁出，其实是为了给儿子凑出彩礼或给父母做养老钱——这又折射出农村养老的无保障。无论如何，婚恋竞争激烈又进一步促使相亲市场瞄准小女孩，在她们十几岁刚初中毕业家长就开始为其相亲订婚，催生出震惊社会的早婚早育现象。

这种程度的借婚姻索要高价彩礼，和卖女儿差异甚小。但收了彩礼一定是将新娘商品化吗？不能这样一概论之。城市中自由恋爱结合而成的工人阶级伴侣面对彩礼的逻辑完全不同。要么他们选择不收彩礼，例如上海的婚姻中仅有 31% 收取彩礼，在全国有 2 成婚姻不收彩礼。要么面对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彩礼也仅是长辈给予新家庭的经济支持，同时显示对新娘的重视尊重。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提高彩礼的动机越弱 [10] 。因为高教育水平意味着她将成为工人，有更强经济自主能力，无需通过高彩礼索要保障。另外， 城镇彩礼数额的增长基本同城镇居民总收入的增长成比例，不似农村，彩礼的增长远高于收入的递增。[11] 在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出彩礼问题的城乡差异。

如果不使用阶级的方法，很容易将彩礼问题粗暴依性别划分为对立阵营。如我们在互联网上所见，简化扭曲为身份政治议题。但科学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彩礼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农村，折射出的是过去工人国家唯能完成其任务，和今日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异化，使得嫁女换彩礼的陋习不死反兴。但若是没有分寸感，简单将彩礼一概论之为卖女儿，又同城镇工人阶级的婚恋实践大相径庭。

再说互联网上因彩礼引发的争议，天价彩礼这一奇观作为导火索，触发了工人阶级青年人婚恋实践挫败中的不断增长的广泛焦虑，反映出

他们在资本主义下找不到解决办法但又不知革命纲领。其背后是工人阶级的日益贫穷和权益不断被蚕食，尤其是女性的就业和生育保障，这反而引发了部分女性对彩礼的错误坚持。

若是有充足的就业和薪资，住房、医疗、养老、育儿、交通等等全部由社会承担，劳动不再被异化，工人也有空闲发展自身，认识朋友，恋爱和自由生育，又何必需要彩礼？唯有透过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这些物质条件。

2. 1949 年革命中伟大的女性解放

当今天的激进女性开始回看 1949 年革命，并将女性解放立足于革命立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更熟悉 1949 年中国革命在女性解放上的巨大进步性。首先给出定论，**在人类历史上，49 年革命是仅次于俄国革命的、第二伟大的女性解放事件**。

革命前，劳动女性饱受家庭和资本家的压迫。她们要么被限制在在暗无天日的家庭生活中，要么在社会上付出血汗或出卖身体。缠足，买卖女性，包办婚姻，童养媳，溺死女婴，家庭奴役和虐待，不能接受教育和不可继承财产，劳动女性身上痛苦承受着着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叠加的所有的黑暗和野蛮，是“奴隶的奴隶”。

但革命改写了一切。中国女性今日获得所有社会权利，基本都是革命后 50 年代的成果，它是中国女性解放的黄金期。[12] 那时真的是日新月异。

娼妓制度是对女性最恶毒的压迫之一，而革命风驰电掣地铲除了它。早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前，解放区就已经开始铲除娼妓，例如 49 年 4 月，哈尔滨人民政府全国首个宣布全市取缔妓院。1949 年 9 月 20 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就已出台，10 月 15 日北京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成立。



1951 年 11 月中旬，上海市委宣布妓院非法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娼妓最多的城市，47 年有超过十万妓女。1951 年 11 月中旬，上海市委宣布妓院非法，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其治疗性病，帮助她们转业以保证她们不转为私娼。劳动教养所标语上红字写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当时收容妓女的性病率在北京大于 95%，在上海有 89%。各地妓女获得政府拨款的集体治疗后，梅毒治愈率达到 40%，淋病治愈率达到 95%。她们中大部分后续成为工人。1956 年娼妓制度基本废除。而 1953 年妓女改造为社会所知后，还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

女工权益方面，1950 年 1 月 10 日，中国纺织工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51 年 2 月 26 日，政府发布《劳动保险条例》，其中规定女职工有 56 天带薪产假，孕期检查费接生费均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担。

1950 年 4 月 13 日新婚姻法颁布，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制。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男女

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双方均有劳动自由。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溺婴，近亲结婚。规定非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不得被危害歧视。离婚自由。法律规定最低婚姻年龄。夫妻有权利使用各自的姓名，废除了强制冠夫姓制度。而反观，至今发达的欧美地区——甚至是以性别平等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仍有冠夫姓习惯。

1950 年 6 月 30 日，土改法明确男女同等的土地所有权，女婴也可以分地，这大力抑制住了溺死女婴的陋习。而在土改完成区，大量农村女性广泛参与农副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被从封闭的家庭中解放出来。52 年约有 394 万女性参与兴修水利。当时女性广泛参与工业建设，有女货车司机，电车司机，调度员和飞行员等各色职业。

1951 年计划在 57 年使得全国 80% 学龄儿童入学。从 51 年到 56 年，各教育层级中的女性占比都显著扩大。1951 年，全国小学女生 1206 万，占比 28%，1956 年为 2231.5 万，占比 35.2%。1950 年普通高中女生 34.6 万，占比 26.2%，1956 年 151.4 万，占比 29.3%。[13] 革命为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打下最坚实的阵地，哪怕资本主义改恶后，2016 年中全球高等教育性别均衡排名中，中国也力夺第一。[14]

避孕、节育和生育是女性命运的大事。1953 年，卫生部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提倡避孕帮助女性参与社会生产。56 年卫生部发布《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要求广泛开展避孕常识宣传和技术指导，各地开设避孕知道门诊，旋律技术宣传人员，供应药物。1954 年避孕药物开始向公众销售。尽管官僚推动避孕的动机基于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但无论如何，新中国在实践上给予了女性避孕的自由。

而生产也是旧社会女性的鬼门关。革命后全国各地建立妇幼保健院，大力推广新接生法，训练接生员和改造旧产婆。以北京为例，从四九年到 54 年，孕妇死亡率从千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零点五。妇科疾病

得到关注和治疗，性病防治被作为卫生工作重点。从 52 到 57 年，梅毒患者在孕妇总数中的占比从 5% 下降到 2%。

育儿若未社会化，那女性很难离开家庭参与生产。革命后全国快速推进组建托儿组织。1956 年，农村托儿组织收容 600 万孩童，帮助妇女可以参与生产。

1953 年的选举法规定男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 1917 年革命中，苏联通过创建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生活保障体系，将劳动女性从体力劳动中解放。产妇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组织、电影院都迅速建立。在中国革命后，除了公共洗衣房，上述社会保障机构也都快速出现。

3. 对比中俄革命中的女性政治权利问题

这一切都是惊人的巨大进步。但革命解放女性的进程中，中国革命的政治权利推进大大落后于 1917 年革命。49 年建成的是畸形工人国家，没有苏维埃和群众参政，官僚篡夺了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群众没有直接选举权。但十月革命创造的是健康工人国家，布尔什维克大力推行工人控制和工人民主，让群众来管理社会，尤其是在妇女之中。

列宁说：

> “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实现；同样，妇女的解放也必须由妇女自己实现。妇女必须自己努力发展这些制度，而这一行动将使她们的地位与旧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地位相比发生彻底的改变。”

1918 年，第一次全俄劳动妇女会在内战中吸引了众多女性参与党和女民兵组织来捍卫革命。1919 妇女部力图把工厂和乡村中尚未组织起来的妇女吸引到公共活动中来，使她们政治化，吸引她们加入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1927 年，18 种妇女杂志出版，发行量达 38.6 万份，解释女性解放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联系，目的是鼓励妇女参政，为党政工作培养女干部。而工农妇女会议旨在促进对女性的政治教育、培训和征聘，妇女选举出的女性代表表参加党领导下的会议和培训班，然后在国家、党、工会和合作社中“实习”。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有经验和信心的妇女层，以发挥公共作用。

成果是 1917-1934 年选举中投票的妇女比例显著上升，城市地区从 26 年的 42.9% 上升到 34 年的 89.7%，农村也从 28% 上升到 80.3%。地方苏维埃中妇女代表比例从 1922 年的 1% 上升到 34 年的 27%，城市从 20 年的 5.7% 上升到 34 年的 32%。布党内女党员从 1922 年不到 8% 上升到 1932 年的 15.9%。[15]

哪怕是现在资产阶级总说要有女性领导，俄国革命也走在前列。苏俄



莫斯科的女工们正在上扫盲课，1932 年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建国伊始，布党便急于发挥女共产党员和女工的才能，赋予她们在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乃至人民委员会中的重要职位和职责。柯伦泰在革命时期她曾是一支军队的代表，革命后被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部长。

4. 一国社会主义限制妇女解放进程

无产阶级革命推动了一系列举措解放女性，但要使工人不断扩大来吸收女性进入社会劳动，要扩大和提升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福利机构，社会生产必须高速发展，也就是计划经济要健康运行，尤其是在革命前落后的中国和俄国。但 1949 年革命没有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也没有推进国际革命。

没有工人民主和工人控制，计划经济失去了它所需的氧气。更关键的是，生产在资本主义下是全球分工，这意味着仅在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生产无法满足社会全部需求，也就是说，计划经济长久上也必须基于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生产，也就是要求国际革命。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一国社会主义滋生出无产阶级波拿巴官僚，他们自上而下的指挥更会带来计划经济的生产混乱和不足。大跃进和文革就是鲜明的例子。

生产进步受阻，社会福利体系就不能推进，女性就不能从家务劳动中被解放出来。因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官僚阻碍计划经济运行的效果开始显现，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日益尖锐。1957 年妇联杂志收到来信，尖锐提问：目前中国妇女解放了没有？妇女解放的标志是什么？参加家务劳动的妇女算不算解放？ 1963 年《中国妇女》杂志两次组织争论“女性活着为了什么？”，讨论职业女性的追求，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矛盾等争论激烈。“我应该再找一个工资多的对象吗？”的来信更是显示出物质的贫穷仍困扰着工人女性的择偶。

那中共官僚的态度是什么？ 1957 年一封题为《职业妇女可以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吗？》的来信引发社会热议，1 个月内引来 90 封回复。妇联副主席的态度是鼓励她们继续工作，但困难的话可以退职回家从事家务。而周恩来 1957 年则在第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提倡妇女参加家务劳动。全然未曾见他们提及扩大社会福利体系，如布尔什维克一般喊出“建立服务业、淘汰家庭个体家务劳动”。对于上述 1963 年的《中国妇女》杂志组织的两次激烈社会辩论，官僚透过《红旗》杂志对这些讨论大行批判，“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看待妇女问题，而不能按照性别差异解决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争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背离了‘阶级斗争’的轨道。”

大跃进时期，女性闭经和子宫脱垂发病率显著升高。大跃进后，农村解散了大部分托儿组织，城镇幼儿园也压缩了规模。60 年到 61 年，幼儿园从 79.49 万所减到 6.03 万，收托儿童从 2933.1 万减到 289.6 万。幼儿园的费用也从国家指出改为家长负担。70 年开始，由于社会生产混乱，人口拐卖开始兴起。到了文革时期，妇女组织基本瘫痪，妇女工作陷入停顿。包办和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陋习重新抬头，在农村尤其严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亲和重婚的现象。[16]

如今，中国激进女性青年喊出“阶级叙事大于性别叙事”的现象愈发可见，这是对革命的忠诚和愿意牺牲的高尚精神。但当官僚用阶级压制女性解放的讨论，既要女性做工又要她们洗衣，本质是牺牲女性来在过去弥补官僚导致的计划经济的不畅甚至混乱，以及在今日为资本主义的压迫打掩护。而当今日部分左派男性喊出“阶级叙事大于性别叙事”，则是他们不理解性别和阶级解放的辩证同一，也是性别偏见仍在作祟。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在说教和推走女性革命者。但女性革命者以及其他少数群体革命者如此重要，她们的独特的作用之一就是作

为社会主义打破旧有偏见的道德攻城锤！ [17]

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说：性别解放本身就与阶级解放为同一进程，**前者恰恰是后者解放社会程度的试金石，完全不必也不应被搁置**。我们说：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女性！

5. 资本主义改恶后的女性处境

1978 年，邓小平上台，标志着选择向资本主义试探的一批官僚开始主导。[18] 78 年到 84 年间，主要改革集中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可这是向农业工业化的反方向倒退。当时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黑龙江省书记直言包产到户是阻碍机械化的倒退，为生产带来巨大问题，主张不能退出集体经济。[19]

资本主义改恶前，全国农业生产机械化很低。重新恢复土地私有制，小农家庭中的旧陋习重新在私有制复辟的道路上获得温床。家庭私有土地增大对男性劳动力和男性继承人的偏好，因为女儿外嫁有可能带走土地，以及小农因为收入提升可以负担在一胎政策下的性别选择技术，[20] 这加剧了农村本未消除的重男轻女倾向，出生性别比开始加速失衡。溺死和丢弃女婴的现象也开始增加。

建国后由于人民公社及城市配给制，被拐卖人口难以获得所在地户口，也不能获得土地和日常物资，人口拐卖现象灭绝。计划经济末期的 70 年代，社会贫困导致人口拐卖兴起。但绝大多数的人口拐卖发生于资本主义改恶后。人民公社解散，城市户籍制度放松，加之农村外出打工兴起，人口拐卖迅速猖獗。从 1968 年到 2008 年间至少有 100 万妇女被拐卖。

80 年代市场机制被引入国企，降本增效和私有化使工人大范围失业。1993-2001 年，全国共有 7000 万工人下岗，编余人员中女性占到

64%。[21] 下岗潮直接影响 2 亿人。很多下岗女工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卖淫。市场化就业更带来了就业性别歧视。

资本主义也带回了大规模的卖淫嫖娼，仅 1987-88 年，卖淫嫖娼人数就接近 119 万。国际性工作者联盟 2024 年的统计指出，中国有 500 万人卖淫，世界第一。其他估算数字只高不低。性侵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的现象也日益猖獗，仅 2018 至 2021 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就有 23.3 万起，年均上升 6.1%。受害者中女童占到 90% 以上。

资本主义改恶为中国女性带来更为复杂的处境。一方面旧的工人阶级被背叛，几近被摧毁，女工尤其沉痛。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新的工人阶级，这为被困在家庭和乡村的女性带来经济独立的可能。市场也使女性就业不受官僚限制。

但中国女性本可借由健康的计划经济获得这一切，不必付出如今的高额代价。实际上，从 1982 年到 2020 年，15-65 岁劳动人口中，中国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显著下降，女性的下降还多 6%。 不过，国有社会保障体系不断被私有化攻击，但工人国家的遗产仍在发挥余热。



1998 年，深圳下岗工人参加再就业招聘。//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最近几年，中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和孕产妇存活率都高于世界水平。2024 年，中国女性高度教育入学率全球第一。

资本主义如何在高速发展时大力吸收女性作为廉价劳动力，就会在危机时将她们毫不留情地赶回家庭。由此我们看到，从 2015 年房地产下行后，就业歧视问题激增，二胎三胎政策相继出台，疫情打击就业，民族主义舆论兴起，政府催促女性回归家庭。一系列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矛盾，尤其是**就业紧缩**，借由 Metoo 在中国被点燃为 2017-2020 年互联网女权运动，这其中反映了当时群众对建制官僚忍无可忍的广泛愤怒。[22] 然后无能的身份政治在中国迅速被群众抛弃。又因为缺乏革命替代方案，从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攻击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性别战争。

但我们要说，主流的仍是危机下青年向左激进化，就业问题是最大的推手。今天的最激进的无产阶级女性青年已然在回看 1949 年革命，喊出要解放要由革命带来。要知道，革命一词对当时的女权运动曾是不能翻越的天堑。

6. 以科学而非悲观的态度面对厌女现象

如今在中国，厌女氛围确实在加强，但革命者要把握好分寸感。当青年人问中国在右转吗，我们不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说是。同样在性别问题上，我们也绝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就爱泼斯坦和韩国 N 号房等重大性犯罪事件，难道中国群众不是无论性别都是压倒性痛骂吗?

坚定宣扬性别保守观念的一小撮人，以及性犯罪者例如德国迷奸女性的性犯罪团伙，绝对是要毫不留情地抨击批判，革命后要通过苏维埃或人民法庭来处理他们。但时下广泛消费厌女内容的群体，相当一部

分是资本主义下承受着经济压力、孤独、迷茫、愤怒的年轻男性，这背后是中共在舆论场公开或私下大力支持厌女言论以分化阶级，制造阶级内部对立以转移群众对党国的不满。

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有多出 3000-5000 万男性，农村一胎政策的最小一批也才 16 岁，经济和婚恋的挫败叠加当然容易使他们更难免疫中共纵容支持的厌女内容。且在波拿巴治下除了右翼表达，其他发泄愤怒的立场都被严厉打压。中共相当大地推波助澜了当前快速弥散的厌女文化。甚至厌女受众的一部分可能恰恰是毛派斯派。这种阶级激进和性别保守甚至稍微倒退的组合，恰恰体现的是激进意识的不平衡和组合发展 。

我们可以借助欧美暂时被右翼民粹吸引的工人阶级来理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些工人阶级，要耐心地解释和说服，而非极左地一刀切拒斥，越来越多的 MAGA 阵营的美国群众不正在 180 度向左转、越来越青睐共产主义吗?

部分中国男性以厌女的扭曲方式表达其对资本主义不满或犬儒心态，他们目前当然不是最健康的激进部分，但长远来看，他们大部分绝对是可以被阶级方法所征服的。退一万步讲，今天中国青年再厌女，也远不能和 1917 年前俄国的保守情况相提并论。可是，1917 年妇女节当日，当维堡纺织女工罢工且号召全城时，男工当机立断就加入了，男女工人阶级一起开启了二月革命。革命可以 24 小时改变人的意识。当 1917 年和 49 年革命承诺婚姻自由时，群众难道不是相当快地就接受了吗?

因为不知出路何在，现在青年确实普遍弥散着悲观情绪。***但掌握着科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更深地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主动自觉地克服这种经验主义式的悲观情绪。不能将暂时以扭曲方式表达***

的阶级愤怒误认为是无法被说服的永远反动。事实上，实际的阶级斗争会克服厌女情绪。在中国因为波拿巴政权，这种克服厌女情绪的阶级路径显然会更曲折或迟滞，但它会出现。

如今号召革命解放性别压迫的女性毛派开始崭露头角。这非常重要，没有理由这一趋势不会继续壮大，革命者必须加以关注和试图发展她们。因为这正是冲击最激进青年中厌女情绪的最有力攻城锤。

7. 中国民族主义和女性解放的关系

群众不满的向右表达不止于厌女这一话题，更广泛的是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其高涨期恰恰是疫情时期，中共培养放任这些“爱国大 V”，用以攻打透过女权运动表达的阶级愤怒，他们成为中共右翼的舆论打手。民族主义一边可以给异见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分化阶级，一边可以用“爱国护国”呼吁短暂稳住群众甚至刻意误导部分群众去对立于任何质疑建制的声音，在性别问题上配合保守家庭观还能将失业女性工人阶级赶回家庭，好用至极。

但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人人肉眼可见民族主义的衰退。如今，就业和面包对群众来说比台湾问题重要得多。而最近美国在伊朗战争受挫，官方抨击境外势力煽动躺平，以为自己能赢得舆论，却不想被剧烈的阶级愤怒反噬。如今，右翼民族主义面对阶级议题不堪一击。

今日，官方的民族主义和群众的民族主义内容左右相反。对于群众，民族主义包含着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它向左和向右的表达形式都存在。且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最健康的部分，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拒斥。但官方的反动民族主义无疑反映的是中国帝国主义的日益自满。

中国官方非常擅长用民族主义压制异见，尤其是性别话题，这有其历

史背景。1949 年革命建成的是畸形工人国家。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发展，就有社会内阶级矛盾仍存在。抗拒国际革命的一国社会建成主义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必然，它具有左右的两面性。它既可以鼓励工人对抗帝国主义捍卫革命，又可以帮助官僚压制工人阶级的不满， 指责工人阶级斗争是反革命。对女性而言民族主义把她们夹在中间挤压，解放后能参与社会劳动的快乐和家务劳动的辛苦的两重滋味她们都品尝得到，恰恰是女性未彻底解放的表现。

但在 1949 年以前，追求家国独立的进步民族主义和女性解放议题是融合在一起的。解放前上海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妓女！解放女性必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必须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扫清封建遗毒。历史也正是如此。这恰恰是不断革命论的体现。这个问题上，我们更能看到不只是打跑帝国主义，更要用国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必要性。也更能理解 1949 年革命的局限。

8. 让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性别解放的左翼旗帜!

俄国女工本身即是开启二月革命的先锋，1917 年前她们比男工更具有斗争性，只是缺乏组织。革命期间布党动员了数十万妇女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她们罢工和建立苏维埃，在各个区选出女代表协助《女工报》复刊，该报是十月革命的支柱之一。十月革命前彼得格勒劳动妇女大会反对对革命胆怯的中央委员会：

> 这次女工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服从党的纪律……只有坚持明确的革命阶级路线，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支持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
> ……
>
> 欢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

1925 年革命中，中国女工也走在队伍前面。在当时的上海，纺织工是工人运动的主力，他们中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1925 年 2 月，日商纱厂罢工就吸引到近四万工人。在当时健康的中共的领导下，罢工迅速扩大，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开启了 1925 年 -27 年的中国革命。

今天在中国，全世界最大的工人阶级里面，亦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女工群体。这也意味着其中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大的年轻激进女性。她们在工人国家的遗产上长大，普遍接受过教育，其中高等教育总数世界第一。她们面对各种社会压迫和矛盾，不断地在自发激进，女权运动和今天的女性革命毛派就是她们激进力量的证明。没有任何理由，她们不会在下一次中国革命中走在前列中并成为支柱力量之一。没有任何理由，革命者不去重视和争取。

纵观中国自 1949 年以来，乃至世界，**女性解放的问题，第一就是女性能否成为工人，第二就是工人阶级能否彻底解放社会**。就第一点，今日中国群众的基本共识是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也就是必须成为工人，正因此就业权利就是炸药桶。这一点同 1949 年前完全不同。

所以今日中国女性解放的问题，只剩下第二点，即工人阶级能否彻底解放社会。今天的中国，就是它历史上最容易直接用阶级纲领争取激进女性的时代。前现代的遗毒已经被 1949 年革命大清算过一次。今日男女青年工人在就业、爱泼斯坦、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问题上基本没有意识差距。这一切都给了革命者历史上最好的土壤。

目前中国激进女青年基本游离在左圈外，但不代表她们未来不会攻入左圈。面对她们，毫不迟疑地说，布尔什维主义者最有自信，因理论、纲领和传统。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在性别问题上打磨理论、阶级方法论和分寸感。

没有理由，布尔什维主义不会成为中国性别解放的左翼旗帜。

让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性别解放的左翼旗帜！



“女工，拿起步枪！”，1917 年俄国的革命海报。//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引用文献

[1] 王向阳. 当前我国农村“天价彩礼”的产生机制及其治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5)：37-46. doi：10.13718/j.cnki.xdsk.2021.05.004 shu / W A N G Xiangyang.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of "Sky-High Priced Betrothal Gift" in China's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47(5)：37-46. doi：10.13718/j.cnki.xdsk.2021.05.004

[2] 汤兆云，郭真真. 育政策与经济水平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2011 年第 1 期

[3] 胡莹，李树茁.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0-47

[4] 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神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 https://stjj.guizhou.gov.cn/tjsj/tjfbyjd/202109/t20210930_86400086.html

[5] 石智雷、徐映梅：《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及其决定机制》，《经济评论》，2010 年第 4 期，第 56-65 页

[6] 韦艳，蔡文祯. 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J]. 人口研究，2014，38(4)：75-86. /Wei Yan，Tsay Wen-Jen. Social Mobility of Females in Rural China：An Assortative Mating Perspective[J]. Population Research，2014，38(4)：75-86.

[7] 程铭莉，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妇女的生存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启示. 《长白学刊》2019-03-10

[8] 诸萍， 近 50 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及时代变迁———基于初婚夫妇户籍所在地及性别视角的分析，《南方人口》， 2020 年第 1 期第 35 卷（总 157 期），第 53-68 页

[9] 张一川，人口学者靳小怡：东部重婚房西部重彩礼，2010 年后婚姻成本爆发增长， 财新网，2026 年 6 月 13 日

[10] 同上

[11] 8 个省区市彩礼过 10 万，您怎么看？ 北京日报，新华报业网发布，2025 年 2 月 27 日 https://www.xhby.net/content/s67bfb204e4b0970096638f7e.html

[12]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5 月

[13]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

[14] Bonny Lin, Truly Tinsley, Leon Li, Brian Hart, Hugh Grant-Chapman, and Feifei Hung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是否低于他国， China Power 网站，2025 年 10 月 16 日

[15] Marie Frederiksen ， 女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经历，In Defence of Marxism 网 站（https://marxist.com/），2017 年 3 月 8 日，https://marxist.com/women-before-during-and-after-the-russian-revolution-cn-simplified.htm

[16]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

[17] Fred Weston, John Roberts, Women, Famil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ellred Books,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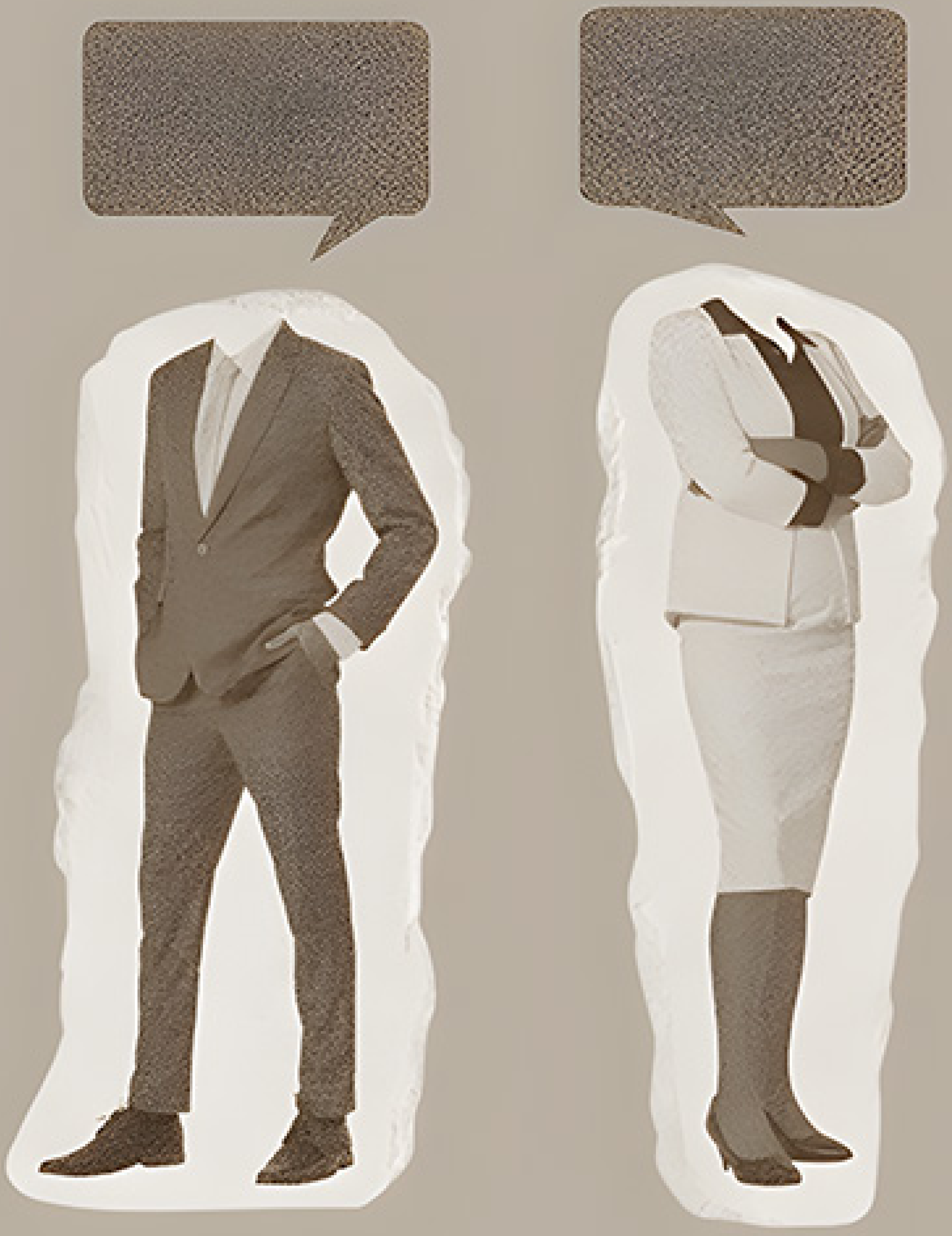
[18] 约翰· 彼得· 罗伯茨，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Wellred Books, 2016, 第十五章：中国向资本主义迈进 https://marxist.com/china-permanent-revolution-to-counter-revolution-book-cn-simplified/%E7%AC%AC%E5%8D%81%E4%BA%94%E7%AB%A0%EF%BC%9A%E4%B8%AD%E5%9B%BD%E5%90%91%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8%BF%88%E8%BF%9B.htm

[19] “独木桥”走出康庄道，2008 年 9 月 1 日，http://app.reformdata.org/print.php?contentid=19819

[20] Almond, D., Li, N. H., & Zhang, S.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 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

[22] 喀秋莎，中国网络女性主义运动背后的阶级推力，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2024 年，(https://telegra.ph/Chinese-digital-feminist-movement-04-23)



本页图片：自制

中国性别战争

China's Gender War

原创 || 作者：思多葛

当今，越来越多的两性问题不断引爆中文互联网舆论，极端的性别仇恨、对立言论也互联网上愈发多见。乍看之下，大多数人似乎已经沿着性别两极分化，纷纷化身“国男”、“女拳”，整个社会仿佛真的陷入了一场性别议题的舆论战争。

为何这类网上的性别对立持续不断？在各种骂战中，工人阶级和青年女性、男性所表达的那种不同的沮丧心理，都是由哪些别的情绪和思想驱动的？中共当局在这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性别对立的议题与根源

在讨论当前中国性别对立这个舆论现象时，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树立的重点是：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中国，女性工人是显著遭到统治阶级性别压迫的那一方。那么，中国女性当今具体在哪些议题上遭到压迫呢？正如我们在社论中解释的，

> 一是就业和劳动权益的问题；二是社会保障系统的问题，它直指住房、育儿、养老、照护、家务劳动等工人阶级再生产自身的需求；三是教育社会和惩处犯罪的问题。

太阳底下无新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权益早已不断收缩，但为何在近期竟成为了引发争议的话题呢？归根到底，我们共产主义者常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会导致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那就会朝向野蛮主义，但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和长期倒退。

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都在近期加剧，却持续得不到解决。在经济增长逐年减慢的前景下，工时问题、失业潮、贫富差距齐腾飞，本就不高的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福利开支开始减少，而言论管制不断收紧，恶性犯罪则愈发增多、社会关系愈发紧张。这是工人和青年完全看不到未来的一个高压社会。年轻男女又没闲，又

没钱，工作学习压力山大、社交娱乐死气沉沉，他们怎能不感到孤独、疲惫、沮丧和愤怒呢？

不过一般来说，工人会从这种高压的物质环境中习得一种模糊的反建制情绪，具体表现为对不平等、特权的厌恶。在巨大的群众性事件中，尤其是阶级和国家问题的重压下，这种反建制情绪很容易朝向明确的阶级意识去发展。

然而，工人阶级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每个部分对社会危机的直接感受都稍微不同，因此反建制情绪并不总是立刻直指阶级问题，有可能先在性别、民族、宗教等其他议题上以左或右的形式 表现出来。

其中，通常当这些反建制愤怒以某种沙文主义或者偏见浪潮而扭曲表现时，往往也不是由于某些自由派、身份政治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们所声称的：是由于某个种族、性别或是其他身份与生俱来就有的偏见和压迫欲而导致的。相反，大多时候，这些是统治阶级有意操纵的情绪，来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在中国，这正是如此。

中共国家的恶毒操纵

正如我们先前分析指出的：资产阶级左手夺走女性工人的就业，官僚右手将她们撵入家庭，女性在资本主义中国下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但统治阶级不仅如此，也同样推进着对于“女拳”或者任何为女性处境打抱不平的声音，从中为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战争煽风点火。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降速，就业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开始加深。人口结构危机制造了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中共国家也开始推行一系列政策，如：解除一胎政策，增添离婚冷静期，缩减非医学流产，加强管制避孕药等，来提高出生率。同时，资本家开始攻击更容易遭到伤害的女性工人的就业权和劳动权益（如产假）。这一切动作的目的和结果，

就是将女性赶回家里生儿育女，“增产报国”。

就如同任何国家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对群众“做工作”是必要的。如果说，以上措施还是官僚通过行政手段暗中限制女性，那么近年来，国家对女性权益发起的口诛笔伐和言论管控，就可谓是明着出手。透过将任何女性对社会不公提出不满的发言都丑化为“极端”言论，国家就可以进一步用社会压力逼迫女性就范。

2022 年 4 月期间的性别舆论战，鲜明地显示了其背后的国家操作。

2022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疫情严重蔓延的时期，共青团中央将国家抗疫吹捧为长征等级的伟大事件，遭到了群众讨伐。当时群众的普遍观点是，当局抗疫混乱百出绝比不上长征伟大，其中也有质疑者说，为革命、为国家奉献的女性，在宣传中到哪去了？

4 月 12 日，《北京晚报》的微博号开始攻击为女性发声的这些评论，将所有质疑国家政策、挑战传统厌女价值观、或是其他为女性发声的评论都打成“极端女权”。紧跟《北晚》，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方也转发了文章，称谈论性别问题就是挑起男女对立、撕裂社会。之后，共青团中央也在微博重提此事，并作出定性：“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

然而，所谓仇男的言论仅占非常少数，而且尽管看起来言辞吓人，但现实中的杀伤力远不及代表真实存在的反动势力——也就是那些号召着要侵犯、施虐、奴役、和灭绝女性的男性沙文主义份子。真要论毒瘤，男性沙文主义是更加反动的。

当时，有网民对标共青团中央，建立了一个“极端男权已成网络毒瘤”的微博话题，该话题迅速被审查删除，而“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的话题则至今存在。


共青团中央
22-4-12 23:02
+关注

【声音：#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

近期，一组以“每一代青年都无愧于时代”为主题，反映长征、抗美援朝、开凿红旗渠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居然被某些人大肆攻击“故意忽略女性”，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有意忽视图片中的女性，制造对立。更有甚者，居然对新闻编辑人员实施“人肉搜索”，进行“网络暴力”——这些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突破底线，激起了公愤。

“极端女权”兴风作浪久矣。虽然每次“发作”都能蒙蔽不少网友，好在时间越长，其真面目暴露越明——凡事都能莫名其妙往“女权”上引的人，并非“脑回路”坏了，更不是真心维护女性权益，而是通过制造“性别对立”吸引流量、借机敛财。曝光度、爆款文以及隐藏其后的灰色产业链……一次次让“女拳”们名利双收。

“极端”，不是维护权益之道，却是有些人的歪门邪道。近期一连串事件表明，“极端女权”已经越来越猖獗，毒性越来越剧烈。全网齐心切除“毒瘤”，还网络一份清朗，已经刻不容缓！

可以看出，在镇压性别问题的讨论的同时，官僚也纵容、甚至是扶植民间的男性沙文主义者，将厌女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反自由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反帝国主义的议程来造势。

坐拥近 100 万粉丝的网红子午侠士就是这样一位极端厌女的、捍卫建制的网红。作为一位涉嫌权色交易被开除的前警察，他曾经反复以造谣、引战、污名化、断章取义和人肉搜索的方式威胁声援女性的活动家，将他们污名化为境外势力。

显然，他捍卫建制，建制也捍卫他。2020 年陕西省网信办明确声明，要支持像他这样的“正能量”大 V 以“新观点……发布相关主题贴文，带动粉丝自主学习，有效拓展和提高【国家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认可度。”在这次事件中，4 月 12 日国家吹起狗哨后，走狗子午侠士第二天就加入战场，威胁要人肉曝光、向国家举报声援女性的公务员，并号召粉丝对其进行网暴。

在 2022 年 4 月发生的这次舆论事件，显然是国家有意识转移群众的视线、分而治之的花招。要记得，当时全中国劳苦大众都被封控折腾得焦头烂额，但国家却坚持要“清零”。当然，后来这种花招还是被当年末的全国斗争给冲破了。但是国家煽动性别仇恨的案例，后来还反复发生。

简单概括这种手法：在难以平息众怒、国家不方便直接下场的事件中，国家会首先树立一个严厉的家长形象、假装伸张公义，然后在软硬兼施地捂嘴反对官方的声音，同时，明里暗里扶植一些支持官方的民间议政网红，给予他们很大的曝光量、让他们混淆视听、甚至发动网暴，并纵容这些极右翼份子建立水军群体。

中共这种恶毒操纵，再加上各大网络平台本身就不会鼓励健康讨论的环境，结果就是在工人阶级之间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在声量最大的官方宣传中，极端仇男的言论被以偏概全地污名化声援女性者。同时，民间只有爱国主义、右翼和厌女言论有言论自由，而反建制、左翼和平权的声音则遭到了镇压。这就营造了广大群众支持建制和反动思想的假象，难免会引起了更广一层女性工人的紧张，并误导了男性工人对性别舆论问题的分寸感。

左圈与女性

简而言之，挑起性别对立、舆论战争的，根本不是无辜的男女工人，而是打压女性权益和言论自由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和他们的右翼打手。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摆正分寸感，回答一系列让普通的女性、男性工人感到困惑的舆论现象。

例如，许多左派之间，尤其是男性左派之间，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既然面临统治阶级如此之多的打压，为何一段时间内（例如 2020 年

前后），许多女性的反建制情绪没有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是首先诉诸为自由主义和身份政治?

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有特权地位（有些最离谱的观点认为，女性能够通过婚姻或卖淫摆脱贫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权！），抑或是女性群体本身具有某种文化、道德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天然地倾向于在同性别之间抱团取暖。这样的观点只反映出这些人脱离现实、滥用术语，甚至是受到了统治者塑造的厌女意识压力。

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向我们指出，中国女性激进化的路线与男性不同，因为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进程将马克思主义的面孔歪曲了。

一方面，中国女性能切身的感受到，过去计划经济下女性的解放没有彻底完成，而改革开放和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女性地位受到突出的、严重的迫害，因此她们对现状有深刻的不满；但另一方面，已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共当局 依然在用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伪革命语言将女性提出的民主议题打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这不得不让女性工人对貌似代表着官方的所谓“共产主义”感到迟疑。

然而，在激烈的斗争中，错误的思想会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互联网女



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的女性医护人员被官僚强制要求剃头。//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权运动之末尾正值新冠疫情迅猛爆发，此时统治阶级在一系列事件中暴露出了自己的虚伪和无能。打着“看见女性劳动者”的口号，群众就性别议题发起了反对建制的斗争，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在这种斗争中成长，并开始扬弃旧思想。群众能看到，正是那些付出了一切血汗、却因为国家打压而得不到关注的庞大女性建筑工人和医护人员撑起了武汉抗疫的前线。女权运动中的阶级意识开始猛烈成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成为了火热一时的流派。

当然，所谓的“马克思女权主义”还是将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置于同等地位这种根本性的错误，而非理解性别压迫是源自于社会以阶级分野的制度。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群众还是从这一时期的斗争和思考中积极地转向阶级斗争的方向。这就是为何近年来，许多女性工人也逐渐模糊地意识到，身份政治将性别议题从阶级斗争中分开，显然是一个分化劳苦大众的做法。这也是为何近来我们现在甚至能够看到一些积极以 1949 年革命带来的女性解放为出发点作为理论基础的女性毛主义者。

具体的分析显示：中国女性激进化的道路并不直接，但依然是在前进的。不过，我们还是会反复回到这样一个让许多女性对共产主义感到迟疑的常见问题：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就意味当前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就要放到一旁？

任何真诚的革命家都应首先坚决地指出：当今女性高度参与劳动，她们的解放斗争，首先是一个经济权益、阶级问题，事关就业、劳动权益等具体议题。女性工人作为劳动人口近一半的部分，没有她们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次，针对家庭和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压迫，必须 针对这些严重伤害女性的民主权利的问题进行批判和支持反抗，将女性的政治觉觉醒引导到阶级斗争这条根本解决之道上。

最后，还有一个事关道德的层面。无论是在中国（上海小红楼）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阶级（如所谓的爱泼斯坦阶级）之间，群众都从中见过无数斯文败类。但是，在中国网络左圈内也不少这种人。譬如未明子，一边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吃着观众们的流量和斗内，又一方面搞后宫，干尽道德沦丧的破事。就算没有如他那么出名，也仍有那些字字不离马列主义，但同时对女性说出、作出沙文主义恶行的人。如此清楚的伪善，岂能赢得群众，尤其是女性战斗工人和青年们的重视？

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家必须旗帜鲜明地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道德标准，必须身先士卒地对抗一切厌女和反动意识形态的压力。当然，这都会是非常自然的。革命理论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对现实清晰的理解，更是会滋养我们的阶级道德——毕竟，在理解女性权益如何深重地遭到统治阶级系统性打压、侵害和侮辱之后，革命家作为工人阶级之中最正直的份子，又要怎么不对这类暴行感到愤慨呢！

因此，女性的反压迫斗争绝不应该被推迟到革命时才开展，而是要从日常的经济、政治和理论斗争中开始争取，革命者应积极努力支持和争取其中的激进分子，将其引导到革命道路上；革命队伍也应当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道德标杆，绝不能容忍任何伤害女性权益的行为。

男性工人的性别意识

我们还应该直面性别战争中的另一层面，也是许多女性读者的疑惑：当今男性工人的性别观念又在什么水平？男性的性别焦虑又是怎么被统治阶级利用的？

我们并不否认，性别对立上统治阶级的借力打力，也是依靠着男性真实的性别焦虑而发动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者也需要理解男性性别

焦虑的根源，才能化解统治阶级在两性之间投下的毒药。

当今资本主义所塑造的主流价值观中，评价男子气概的标准首先是经济能力。这意味着，男性如果缺少经济实力，不能够养家糊口、娶妻生子，就被视为社会的失败者。男性要么寻找办法进行阶级跃升，成为小资或是资产阶级，要么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作为工人阶级接受高度的剥削。这种惩罚性的观念使得一些男性反过来认为，两性关系中的一切不顺利都是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好。男性的情感教育因此呈现出高度缺失和异化的状态，为统治阶级的毒鸡汤留下来趁虚而入的空间。

进入 2020 年代，中国的工资增长开始放缓、工时也维持在高位，失业的威胁也愈发膨胀。生活在危机时代，一方面为阶级意识的上涨提供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男性工人以经济基础的性别焦虑。

贫苦的主流层男性尽管同样诉求性别平权、阶级解放，但不同于女性用身份政治来反建制，这一层人反对身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将父权制、统治阶级的罪恶怪罪于男性身上而分化工人阶级。毕竟，这些意识形态确实是在将社会所有病症怪罪于男性。这样的男性，并不认为自己手中握有任何特权，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承担统治阶级罪



进入 2020 年代，中国的工资增长开始放缓、工时也维持在高位，失业的威胁也愈发膨胀。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行的责任。

看到如此情况，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开心地火上加油，不只制造对任何女性诉求的恐慌，更是散播一种非常有害的幻想：资本主义“中国梦”是可以让任何男性享有特权的，男性工人应该要拥护资本主义，拥护统治阶级。因此，主流层男性反对身份政治的发言反而被国家当枪使，与反动层男性支持政权和民族主义的发言混杂在一起，作为向女性施压的一部分被放大宣传。

低烈度冲突的持续

至此，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当今性别战争的现状。

从 2025-26 年之间，性别议题上引爆的舆论冲突依然在持续。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有意引导，希望冲突持续以受控的方式发生，以此既可以逼迫女性进一步放弃组织、将她们赶回家庭中提高生育率，也可以加强男女双方的性别焦虑来转移阶级矛盾。

政府依然在使用前文我们提及的拉偏架策略：打压为受压迫者发声的言论和组织，并暗中鼓励厌女言论。2025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明确将 " 宣扬极端女权、挑动性别对立 " 列为整治对象，发动了一个月的软性镇压。截至 2025 年 2 月，微博、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百度、知乎、豆瓣、哔哩哔哩等重点平台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 103 万余条，处置账号 9.7 万个。4-6 月，性少数的组织平台，例如同志之声、华人彩虹联盟，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压，被污名化为“境外势力”。甚至直到 2026 年 3 月的劳动女性节之前，也有大量的女权主义的账号遭到封禁。

同期，厌女思想却得到了国家背书。2025 年 6 月，评论性别焦虑的“捞女游戏”上线后，一方面引爆了大量女性以举报创作者进行抵制，而

后却得到了国家的背书。《北京青年报》发文声援称这款游戏“以创新形式筑牢青年婚恋安全防线”，还获得了新华网、央广网的转发。官媒对厌女言论的背书，给予了右翼份子更大的积极性——事后，对于这款游戏，有些人反而表示：塔都下场了那就不得不买了。

这样会不会引发女性进一步地反对建制呢？为了预防这一点，统治阶级还有时会返回来为女性说一些漂亮话，假装各打二十大板，作为安全阀控制的一部分。在各类官方宣传的“新型婚育文化”中，国家一方面希望鼓励女性回归传统家庭文化，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破除男主外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希望两性平分家务。在当前对女性独立生活的打压空前加剧，而社会化抚养服务完全缺失的当今，这种倡导是完全虚伪的。

我们也可以从不断下跌的生育率中，看出为何当局要持续加强这样的宣传。2026 年 1 月，统计局更新人口数据，中国生育率首次跌破 1.0，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主要国家。同月，官僚则紧张地开始对避孕套重新征收增值税，未来将涨价 13%。

自从 2020 年女权运动迎来第二次爆发之后已经过去 6 年，我们能看见性别议题的舆论战争依然是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但却没有引发巨大的引爆。为何我们会目睹性别战争以低烈度形式持久发生呢？

根本上，性别战争基本上是由统治阶级挑起的冲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本身就为工人阶级的繁衍生息造成困难，同时又以失业和降工资打击他们，并逼迫女性工人回归家庭；官僚一手配合资本家赶走女工人的同时，以各类手段打压女性权益，逼迫赶回家庭为生育率做贡献；同时为了防止男女工人的将矛头指向建制，阻止任何人为女性发声的同时，人工地加强厌女言论激怒女性，并制造极端女权的稻草人激怒男性——以此来导致底层互害。可见，统治阶级是有意地将

性别冲突维持在持久而可控的水平上，以避免像疫情期间那样，性别问题中的不满上升为反建制的阶级意识。

当然，再如何转移注意力，统治阶级始终还是不能彻底掩盖日益上涨的阶级矛盾。愈来愈多的工人表现出对阶级议题的敏感。更不用提，经历了 996 运动、毛热、反封城运动等事件，近年来一系列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用语已经流行开来，如打工人、牛马、社畜、资本做局、韭菜等，也逐渐进入日常玩笑和网络流行语之中，被用于形容考试、求职、消费等各种生活情境。

最重要的是，在彩礼、相亲、生育、婚恋等热门事件评论区中，尽管不被屏蔽的言论都是反动和分化的沙文主义思想，但也开始显著地出现了一些反对统治者进行阶级分化的声音。

鉴于中共独裁波拿巴主义制度的言论管控，我们难以准确测量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内庞大的工人们内部有多少人对性别议题，乃至任何议题，采取着什么态度。但本文已经充分证明了：网络上性别战争的最大推手和受益者绝对是中共当局和他们所服务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需要工人阶级互相持续着永远没有赢家的性别战争，借以忘却工人阶级绝对有办法打赢的阶级战争。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作出过一份绝对科学的结论：

>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重建资本主义的中共想要让我们臣服于性别压迫、性别战争的兽性，而革命共产主义者则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工人阶级为彻底解放人性的伟大斗争。



本页图片：公共领域

身份政治的破产

The Bankruptcy of Identity Politics

原创 || 作者：比比多味豆

2024 年底，特朗普胜过卡玛拉·哈里斯，正式再次当选总统。民主党在本届选举创下了自 1988 年以来最差的表现。由于特朗普本身受到很多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指控，且上一次大选也是赢过了女性候选人希拉里，民主党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再次祭出身份政治大旗哭天喊地道：‘‘意识落后的美国群众宁愿让特朗普这样的人再次胜选，也不愿意有一个女总统’’。很多人把这看作是‘‘觉醒（woke）主义的死亡’’。

但特朗普胜选的原因难道真的是因为美国群众不愿意有一位非裔/印度裔女总统吗？[1] 还是由于对于建制派尤其是民主党深深的憎恶？本文将对这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以解释何为身份政治，谁在经年地推销它，为什么目前它在全世界都遭到憎恶，以及这究竟体现了群众的什么意识？

什么是身份政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开始，身份政治在西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共同发展了起来。后现代主义认为概念、思想乃至语言本身都是主观且任意的“建构”并具有压迫性，不存在客观真理，唯一的真理存在于个体经验。因此，身份政治的哲学内核即是纯粹主观的个人主义，即唯心主义。它假定只有来自受压迫群体的个体才有能力理解——或有权代表——该受压迫群体。任何由受压迫群体成员提出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指控都必须被自动接受。如果任何人拒绝这种指控，那么拒绝本身就自动成为一种压迫行为。

简单来说，身份政治认为人们可以且必须基于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性取向或文化背景等特定身份，结成**跨阶级**的社会政治阵线。在这一框架内，一个人的经济阶层被视为一种身份认同形式，而非社会内部的根本分歧。与此同时，例如，女老板与女员工之间、或黑人雇主与

其雇员之间的阶级对立，都被掩盖甚至被指责为次要的。从行动上来说，它通常指的是通过配额、语言变化和提高意识等手段，在身份政治基础上，打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形式的压迫。比如通过推动企业高层“多样性”，让更多女性进入公司董事会，或者选取一个黑人总统等等。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上为少数群体赢得了“代表权”——基于自身特定身份获得特权地位，却未能解决社会上更广泛的压迫和不平等问题。

身份政治的兴起

身份政治兴起的时间点也并非偶然。由于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背叛，6、70 年代的一系列群众运动接连失败。[2] 在这种背景下，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党和共产党感到失望，但他们的反应不是与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决裂并重回列宁主义，而是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思想，并在所谓“解放”运动中，基于身份认同（针对黑人、女性、LGBT 群体等）的立场，挟持了很多本身出于阶级立场的运动。他们并不在意资本主义是种族、性别等具体压迫的基础，也不认为结



由于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背叛，6、70 年代的一系列群众运动接连失败。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束压迫的方式是团结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

而这也被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统治阶级所推崇利用，以身份政治抵御革命思想，并在他们试图分裂工人阶级和误导阶级意识的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到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这一现象逐渐成为了主流，以至于它基本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算在真正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群众运动兴起之时，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 MeToo 运动，这些运动也很快被自由派和大企业强行劫持，并悄然被身份政治误导削弱。

身份政治的谎言及危害

以女权主义为例，身份政治认为争取女性解放与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相是分离的，需要通过反抗男性或者用女性替代男性的社会地位来获得女性的解放。但上层女性真的能帮助解放女性劳苦大众吗?

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任期间大幅度削减了公共服务并且将负担推往家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受害的是女性：超过一半以上的英国女工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生育补助、有薪产假与较短的工时，而托儿服务的公共开支则降到西欧最低的水平； 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梅洛尼，允许反堕胎组织进入提供堕胎服务的公共诊所和咨询中心，并大幅削减针对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资金投入；而中国以‘‘女强人’’自称的董明珠，也被曝出严格规定女员工的工作发型（如要求长发盘起或留齐耳短发），并经常不分男女地强制员工深夜加班，所有违反制度的行为都将面临无情的惩处甚至开除。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由此可见，阶级联合是身份政治的核心谎言之一。而我们要说，**不存在跨阶级的反压迫联合**，正如更具权势的女性并不会为真正的劳动女性解放而奋斗。

身份政治的错误主张甚至会破坏工人阶级的斗争。比如 2018 年 3 月 8 日西班牙的妇女运动，该运动吸引了 530 万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响应罢工号召，数十万人在西班牙各地参与示威游行。这场声势浩大的动员活动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但根本上实际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积聚的巨大不满，例如，同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退休人员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然而，核心问题尤其与妇女受压迫有关：工资差距、妇女在家庭、工作场所、教育中遭受的暴力和骚扰、家务负担等等。

然而，这场运动的女权主义领导者却要求示威活动中只能有女性参与的纠察队和单独的女性专属区域，并且只允许使用紫色旗帜。罢工应该只由女性参与，而男性则代替她们上班——也就是说，充当工贼！这将严重限制 3 月 8 日运动的范围，并使总罢工完全不可能。这完全违背了运动的利益，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份政治的狭隘视野、反动和分裂性，她们所代表的思想流派和明确的意识形态，不仅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本质上反对女性解放斗争本身的利益。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拖泥带水：***我们明确反对身份政治，这是分化误导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

诚然，在资本主义下，对于女性，性少数群体及少数族裔的压迫是真实存在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百分之百支持受压迫群体的彻底解放，且对此绝无丝毫犹豫或含糊。受压迫群体的解放问题绝非次要问题：认为它们对“纯粹的”阶级斗争是干扰或累赘，并将争取这些群体解放的斗争推迟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的想法，是完全错误，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 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反对压迫，不仅要言辞激烈，更要付诸行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各色压迫，但我们坚持唯有阶级斗争才是解放各类受压迫群体的根本可行方法。

为什么说身份政治破产了

这么好用的反动工具也有其不管用的一天。今日，越来越多劳苦大众不再相信这一套虚伪叙事，而更多的激进情绪正通过阶级斗争体现出来。关于身份政治破产的最好例子之一，就是特朗普 2024 年的胜选。

要理解一位公开表达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候选人如何成功赢过了卡玛拉·哈里斯这个问题，其实只需要去分析一下两者的票型 [3] 就能够略知一二：在 2024 年的选举中，特朗普赢得了白人女性（53%）和拉丁裔男性（54%）的多数选票，并且与 2020 年的选举结果相比，在黑人选民中也获得了显著支持。考虑到特朗普一直以来对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态度，这个数字一下子就重创了身份政治的说辞。除此外，特朗普赢得了大多数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选民，身为少数族裔女性的哈里斯却在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选民中表现优于她的白人亿万富翁对手。

这样一对比，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党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身份政治之所以崩塌，是因为群众中蔓延着一种更深层的、反建制的阶级愤怒，超越了单一身份议题。



关于身份政治破产的最好例子之一，就是特朗普 2024 年的胜选。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这毫不令人惊讶或“奇怪”。特朗普当时的竞选纲领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不变或下降 [4]，尤其是随着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在大选中，特朗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和利率，将高薪工作带回美国，并结束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就连对他反移民政策的支持，也以高度扭曲的方式反映出阶级愤怒——他们对缺乏体面工作、上学、住房等感到不满，而特朗普当然将责任归咎于移民。

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党以及所谓的 " 左派 "，始终倾向于身份政治并忽视工人阶级——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男性还是女性、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事实上，尽管多年来民主党一直叫嚣所谓的平等，黑人财富与白人平均财富的平均比例从未超过 1992 年的 21.6%。[5] 1998 年黑人的白人财富占比约为白人中位数的六分之一，但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持续的大衰退之后，美国的黑白人贫富差距急剧增加，并进一步远离了这一情形。在别的西方国家中，情况也是类似的。这些严峻的统计数据反映出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与压迫是无法以多元配额等方式解决。

同时，在拜登政府任期中，拜登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坚定”支持为他赢得了“种族灭绝乔”的称号。群众们清晰地看见并体会到，他的“民主”政府公然压制集会权，全国有数百名学生因和平抗议声援巴勒斯坦而惨遭殴打，3200 人被捕。拜登曾发誓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然而他却压制了铁路工人的罢工权。他承诺结束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驱逐政策，但最终驱逐的无证移民比他的前任还要多。

正是民主党的虚伪，把群众推向了反建制的方向。与此同时，所谓的“左派”由于缺乏坚定的阶级立场，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只会永远重复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比如伯尼 · 桑德斯，在获得大量群众支持之后却转向为希拉里这样的建制派站台，而不是为受压迫阶层而战，

这只会让他们在工人阶级的眼中失去信誉。

因此，在缺乏明确的基于阶级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右翼煽动家就有机会利用数百万人累积的阶级愤怒——他们认为华盛顿的自由派当权者忽视了他们，而特朗普却是唯一一个在竞选演讲中声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人。虽然我们知道特朗普的本质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他在演讲中说的话也都是一些煽动性的空话，但显而易见的是，长久被忽视的工人阶级在特朗普这里短暂地找到了**长期以来对于建制派的仇恨的出口**。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也加速了身份政治的破产。身份政治长期以来经常被用为攻击左派领导人的武器，比如在 2019 年，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群众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工党领袖。但在关键时刻，议会工党的右翼领导层因为科尔宾曾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并批评以色列政府的种种行径，便以所谓的反犹主义为由攻击他。他立即退缩了，这使得工党右翼得以转入攻势，驱逐包括科尔宾本人在内的左翼，并从上到下对党内进行了清洗。而在 2023 年起以色列明目张胆地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后，很多群众非常直观地经历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如何把反犹的帽子扣在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家、学生头上，支持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而这也让他们更加痛恨身份政治。

右翼民粹的短暂抬头和衰落

自然，在特朗普政府从 2024 年执政到今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这位公开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和之前的自由派，其实是同一枚资本主义建制硬币的正反面。

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以色列对于加沙的种族灭绝并没有停止，甚至

还进一步把黎巴嫩、伊朗卷入了战争之中，而美国挣扎着要从这一局势中脱身，它和伊朗的战争把全世界的经济都至于更深的危机之中。美国对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绑架行动，以及对于古巴的步步紧逼，都把国际法放在明面上侮辱，进一步暴露出了美帝国主义的虚伪和霸道。

群众大规模拒绝身份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对种族主义政治高度支持。特朗普的反移民举动甚至激起了更深的愤怒。这也反映在了 2026 年初反对 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明尼阿波利斯的总罢工之中。在明尼阿波利斯，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去阻止这些突袭移民的反动行动。

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去年年底大幅下降。现在，大多数美国公民都赞成彻底解散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参与罢工和反对移民执法局（ICE）的很多人中可能曾在选举中投票支持特朗普，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能赞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遣返罪犯等做法。但显然，当全副武装、蒙面执法的移民执法局（ICE）特工闯入你的社区，带走那些没有犯罪的邻居和同事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特朗普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在引发越来越大的反弹，并带来他本人和美国帝国主义都始料未及的后果。在 2024 年特朗普以一种扭曲和反动的方式，利用了工人阶级对建制派的愤怒情绪而胜选，但在当下，特朗普已经证明了他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无法为民众提供高薪工作。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飙升，紧随其后的还可能有生活用品价格的升高。爱泼斯坦档案的曝光也加剧了统治阶级的信誉危机，同时也损害了特朗普及其亲信的声誉，甚至影响到特朗普的支持者。

因此，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群众对他虚伪的承诺感到失



特朗普的反移民举动甚至激起了更深的愤怒。这也反映在了 2026 年初反对 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明尼阿波利斯的总罢工之中。//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望、愤怒，舆论风向也在急剧转变。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种种激进化的迹象、潜在的左倾化趋势，以及阶级斗争的加剧。例如在纽约马姆达尼的当选——他当然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想要和资本主义决裂。他的当选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可以体现出群众不满特朗普主义之后的左转。

我们也能在其他国家看到相似的发展：英国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自去年四月以来一直保持民调领先，很有特朗普 2024 年的影子。但与此同时，当一个名为“你的党”（Your Party）的新左翼政党宣布成立时，短短几天内就有 80 万人注册加入。扎克 · 波兰斯基领导的英国绿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飙升：而他们获得群众支持的原因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他们对于消除不平等、谴责亿万富翁的承诺。

这种将焦点转向大胆的左翼反紧缩政治的趋势，无疑与一大批年轻人的诉求不谋而合，他们反对亿万富翁支持的建制派，但也希望用左翼的、对抗建制的替代方案来挑战右翼民粹主义。群众正在努力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他们考验着一个又一个政党领袖，但很快就发现了所有现有组织的缺陷。它们可以迅速崛起，表达群众的愤怒和不满。但

与现实的接触最终会导致群众大失所望，使钟摆进一步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普遍的政治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选举方面的剧烈波动上，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

目前特朗普的衰落，及欧洲右翼民粹代表人物之一匈牙利欧尔班的下台，都无疑指明群众不会长久地被右翼民粹主义所迷惑，尽管他们会走弯路，但他们整体的方向是向左激进的。

唯有阶级战争能消除各色压迫

尽管身份政治已经几乎人人憎恶，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未来资产阶级继续利用身份政治和交叉性理论试图扰乱阶级斗争视听的可能。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理解身份政治的不可行及其害处，并提出革命性的替代方案。

因此，对于革命共产主义者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清晰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纲领，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敌对阶级思想，为群众的斗争指明一条清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和资本主义作最根本的决裂**。

剥削和受压迫者的前进道路并非是由特朗普、法拉奇等发动的一场反动的战争，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留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身份政治和多元化，而是要推翻所有亿万富翁、银行家及其腐朽制度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歧视和压迫，这些歧视和压迫是资本主义所继承、加强或创造的，而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身份政治只会分裂工人阶级。真正结束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团结各个背景的工人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它，并以社会主义生产计划取而代之，以满足社会上每个人的需求。只有这样，偏见和压迫的物质基础才会被消除。

参考文献

[1] Rogers, Katie. “美国何时才能迎来第一位女总统？”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4年11月8日. https://cn.nytimes.com/usa/20241108/harris-woman-president/.

[2] Gliniecki, Ben. “Strikes and Industrial Militancy in the 1970s.” The Communist, March 10, 2023. https://communist.red/strikes-industrial-militancy-1970s/.

[3] CNN. “2024 Election Exit Polls: National Results — General Election, President.” CNN. Accessed July 22, 2026.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national-results/general/president/0.

[4] Mishel, Lawrence, Elise Gould, and Josh Bivens. “Wage Stagnation in Nine Char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6, 2015.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charting-wage-stagnation/.

[5] Hanks, Angela, Danyelle Solomon, and Christian E. Weller. “Systematic Inequality: How America’s Structural Racism Helped Create the Black-White Wealth Gap.”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February 21, 2018.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systematic-inequality/.



唯有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彻底终结一切压迫



本页图片：自制

家务劳动是“无偿”劳动吗？错误的理论前提导致实践中的反动

Is Housework an "Unpaid" Job?

转载 || 作者：David Rey　出处：In Defence of Marxism/ 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反对女性压迫的斗争，左翼阵营和女权运动内部的部分人士重新提出了“家庭主妇工资”的概念。他们将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归类为“无偿”劳动，声称资本家正是利用这种无偿劳动来降低成本。马克思主义对此持何立场?

著名女权主义者、家庭主妇工资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西尔维娅·费代里奇 (Silvia Federici) 支持这一诉求，理由如下：

> “这种工资制度旨在改变照护工作的性质，并强调照护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家务劳动必须被视为一项有偿活动，因为它‘有助于劳动生产和资本生产，从而使其他任何形式的生产成为可能’。” （引自此处）

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左翼以及女权运动的观点概括如下：在家庭中，工人的孩子被生育、喂养和抚养，他们将成为未来的劳动者。资本家免费获得了这些劳动。他们对这些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被企业剥削的劳动者的养育没有任何贡献。此外，这种“再生产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的“创造者”是家庭主妇，而她却分文未得。她的“劳动”被资本主义视为低技能、低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只重视男性在家庭之外的劳动。总之：如果“男性”因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劳动而获得报酬，那么对培养新一代劳动者至关重要的“再生产劳动”也必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家庭主妇也应该获得工资。这将使她在家庭中获得独立性。

理论问题需要严格界定的原则，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混乱。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基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科学的视角，它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更具体地说，是基于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即工资的构成）。其次是政治的、社会主义的视角，它符合工人阶级，特别是劳动妇女在争取社会解放、争取社会主义以及推翻父权制家庭的斗争中

的普遍利益。

我们将基于这两个视角来分析家庭主妇承担的家务劳动。这基于对资本主义规律的理解，而这些规律决定了工资的水平。如果我们对这些规律的理解有误，那么任何关于家务劳动报酬的道德说教都无法解决性别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以最基本的例子作为出发点：一个双职工家庭，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则在家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

什么是工资？

首先，我们应该先定义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以及它是如何确定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为公司、机构或个人提供劳动所具备的体力和智力，而这种劳动则以工资的形式获得报酬。

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体现，与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取决于在每个时代既定的社会条件下，维持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数量。



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体现，与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因此，劳动者可以用工资获得维持日常工作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食物、住房、衣物、教育、交通等等。

通过工资实现劳动者的再生产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工资使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力得以再生产，从而保证他们能够每天从事劳动；另一方面——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工资使他们能够组建家庭，从而确保未来劳动者的性繁衍，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在劳动者精疲力竭退出生产过程后继续运转。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工资和家庭劳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以上述工资定义为基础。马克思指出：

>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一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一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卡尔·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 年）

在同一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了以下几点：

>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卡尔·马克思，《价值、价格和利润》，1865 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明确强调，工资不仅是为了维持单个工人的生计，更是为了维持其家庭的生计，包括妻子和子女的生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解释的：

>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部分，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1867 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他还指出

>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象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45]。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劳动力的买和卖”，第三节，1867 年）

恩格斯对此也有明确的阐述。在他著名的《资本论》书评中，他解释道：

>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测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书评]，发表于 1868 年《民主周报》，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关于工人培训和教育费用（也包含在工资中）的论述很有意思：

> “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劳动力的买和卖”，1867 年）

核心问题在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释的，工人的工资涵盖了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维持工人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以便工人能够每天回到工作岗位，并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例如，组建家庭，留下后代。简而言之，所谓“再生产劳动”（正如部分女权运动人士对家务劳动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工人的工资中。

从资本主义规律的角度来看，不直接支付家庭主妇在家务劳动的报酬并不存在经济不公。她应得的工资——也就是她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已经包含在家庭成员外出工作的工资中。我们看到的并非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家庭主妇遭受的压迫和奴役，她被迫扮演丈夫和孩子的佣人，完全依赖丈夫和孩子维持生计。因此，这部分女权运动人士要求家庭主妇获得工资的诉求，不过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正如我们稍后将要解释的，这种观点也是反动的，并且没有任何科学经济学的依据。

资本家真的如此顺从吗？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妇女从事生产性劳动，即为她

的孩子和丈夫（作为雇佣工人）的生产做出贡献（她为他们准备食物、给孩子洗澡、照顾生病的孩子、给他们穿衣、清洁和维护家庭等等），那么妇女就应该被视为工人，像她的丈夫一样，应该获得一份价格工资，即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当然，她并非直接从任何特定的资本家那里获得报酬，因此注定要饿死，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家庭主妇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究竟来自哪里呢？如果一位家庭主妇一分钱收入都没有，那么她用来抚养孩子、支付医疗费用或维持生计的钱从何而来？无论怎么思考，答案都显而易见。妻子和孩子生活所需的一切（食物、住所、衣物、教育、医疗、水电等等）都只能——正如现在的情况一样——来自丈夫的工资。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的工资仅仅用于维持他自己的生活，那么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什么也得不到。或许资本家们真是太仁慈了，他们给工人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许多人的生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如果资本家们认真听取费代里奇之流的论证，他们会说：“你们的提议听起来不错。妇女必须获得劳动报酬，而且，由于我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足以养活不止一个人，我们将把工人的工资降低到勉强糊口的



家庭主妇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究竟来自哪里呢？ // 图片来源： 公共领域

最低限度，就好像他独自生活一样（为了不违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如这些左翼顾问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这一理论两个世纪之久），同时，我们将给予家庭主妇她应得的那份，让她能够自食其力。”换句话说，雇主每周将支付两份工资：一份给雇员，一份给雇员的妻子。

为家庭主妇争取工资将是女权主义事业的一大胜利，尽管这意味着丈夫的工资要减半。最终，一切都不会改变；夫妻双方的工资加起来，也和丈夫之前的工资一样。资本家绝不会比以前付出更多。那么，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这证明丈夫的工资包含了妻子和孩子赖以生存的部分，这正是我们想要论证的，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阐明和论证过的。

家庭工资的贬值

家庭工资和福利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以多种方式得到印证。

在西班牙这样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女性大规模参与生产劳动的时间晚于西欧和北美。因此如今老年人常常会说，四五十年前一个家庭只需一份工资（通常是丈夫的工资）就能维持生计，而现在夫妻双方都必须工作——但即便如此也仅勉强糊口。这会对马克思关于家庭工资构成的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种变化源于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导致资本倾向于降低平均工资水平。因为女性工作后，丈夫就不再需要额外支付“额外”的津贴来养活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

马克思此前已解释过这一点，他阐述了机器对劳动家庭的影响，不仅包括妇女外出工作，也包括生活在家庭核心的儿童：

> “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

> 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第三部分，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换言之，维持家庭生计所需的工资会随着家庭成员人数的增加而递减，这反过来又证实了每个人的工资都包含着维持整个家庭生计的相应份额。

当然，正如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方面（价格、利润率、剩余价值率等）一样，资本家并非逐一调整工人的工资，仔细权衡每个工人的具体情况。而是根据各生产部门和地理区域的具体条件，结合该区域的平均家庭类型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成本来设定平均工资。

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妇女外出劳动对家庭的影响，并在《资本论》的一条脚注中写道：

> “由于某些家庭职能，例如哺乳和哺育子女，无法完全取消，被资本剥夺了劳动的母亲们就必须尝试一些替代方式。诸如缝纫和修补之类的家务劳动，必须用购买现成物品来代替。因此，家庭劳动支出的减少伴随着货币支出的增加。维持家庭运转的成本增加，抵消了增加的收入。此外，在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准备方面，节约和判断也变得不可能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注释 39）

简而言之，无论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后家庭收入增加多少，都会被家庭

维持成本的增加所抵消。这些成本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以前不需要的必需品（衣服等）消费增加，也可能是由于妇女需要外出工作来照顾孩子、打扫房屋等。

孩子是家庭主妇生产的“交换价值”吗？

最后需要分析的是，这一新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家们提出的论点：家庭主妇是劳动者，她们的功能是将孩子培养成“劳动力”商品，新的挣工资的人，拥有“交换价值”，即生产成本。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她们声称家庭主妇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劳动报酬。虽然这一点在我们之前的分析中已经基本讨论过，但值得就此展开讨论，以得出新的结论。

伊莎贝尔·拉拉尼亚加、贝戈尼亚·阿雷吉和赫苏斯·阿尔帕尔在他们的著作《在生产与家务劳动》中指出：

> “生产性劳动对再生产性劳动的忽视，源于经济理论所支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下，旨在满足特定需求的劳动被视为使用价值，而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则被视为交换价值。商业只赋予能够提供交换价值的商品以价值，这使得再生产性劳动失去了其社会意义，并因此将其限制在家庭领域，因为其经济效益无法衡量。资本的逻辑混淆了劳动和就业，并强加了一种狭隘且带有偏见的经济活动理解。”（拉拉尼亚加、阿雷吉和阿尔帕尔，《再生产与家务劳动》）

在另一位家务工资的著名倡导者伊纳基·吉尔·德·圣维森特（Iñaki Gil de San Vicente）的论述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混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对工资概念的误解：

> “如果我们把投入到家务或生殖领域的价值纳入有偿劳动力的范畴，工资水平将会比现在高得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缺乏承认再

生产劳动的机制，它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剥夺。因此，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自身利益，会掩盖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如果我们公开这些无偿劳动或对其进行报酬，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将会下降。”（德·圣维森特，I. G. (2000)《资本主义与性别的民族和社会解放》）

这种表面上看似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完全错误。首先，该论证的一部分与以下事实相矛盾：儿童教育——作为未来劳动者的重要训练环节——是在家庭之外进行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学院，母亲（或父亲）都没有直接参与。其次，我们已经看到，这笔费用已经包含在丈夫的工资中，他通过税收或费用支付这些服务。同样，我们也看到，孩子、母亲的抚养费以及其他维持家庭运转的费用也包含在丈夫的工资中。

费代里奇、吉尔·德·圣维森特及其同伙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解释如果父母（或母亲）将子女作为“雇佣工人”进行商品化，为何他们却无法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一分钱，即便资本家购买这些“商品”供其在公司使用。资本家究竟从谁那里购买商品？并非从父母那里，而是



认为家庭主妇也是劳动者，她们的职责是把孩子培养成像挣工资的工人一样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力”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图片来源：needpix

从“劳动力”商品本身，也就是从孩子们身上。年轻的工人通过为资本家的企业付出生产性劳动来赚取工资——这是他们的“交换价值”——这份工资属于他们，也只属于他们。凭借这份工资，这些年轻的工人获得了维持生计所需的生活资料，其中包括他们应承担的家庭开支。他们甚至可以独立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件物品，无论其使用价值如何，一旦被交换，进入市场并换取货币，就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并非仅仅取决于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人力劳动。我可以制造一双鞋，但如果是自用，那么它们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是人类劳动为满足特定需求而生产的物品。只有当我把鞋子拿到市场上去卖时，它们才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我才能用它们的货币价值来换取报酬。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的区别在于，雇佣劳动的所有者是劳动者本人，他可以自由地将劳动出售给不同的资本家。而奴隶劳动的所有者并非奴隶（他没有自由地选择不同的奴隶主），而是奴隶主。劳动力只有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才成为商品，在此之前并非如此；劳动力是由其所有者，即劳动者在寻找工作时带到市场上的。

因此，家庭主妇的劳动并非生产待售商品，无论这些“商品”是她的孩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所谓的家务劳动是指维持家庭的运转，这与古罗马的家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在法律意义上是“自由公民”。

如同古代农民家庭一样，女性生产供家庭消费的使用价值。家庭内部的育儿活动属于使用价值的范畴，而非待售商品。显然，当孩子长大成人成为劳动者时，他们的劳动力就成为一种商品，并具有交换价值，这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然而，孩子未来“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赋予他们“交换价值”，也不会将

他们未来的劳动力转化为当下的商品。伴侣生育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向资本家提供劳动力，而是本质上受人类情感的驱使。生育和养育子女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只有当孩子们决定自谋生路时，他们才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从而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只有那时，他们的劳动力才能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随时准备接受雇佣奴役。

这一论点与以下事实并不矛盾：由于员工的疲惫、年老或死亡，资本家需要不断更新劳动力，因此他们有义务支付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们能够生育和抚养子女，而这些子女日后将取代他们在工厂车间工作。资本家为此买单，但这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夫妇可能没有孩子，孩子可能在成年之前就去世，或者他们可能在雇佣劳动之外找到了其他谋生手段。但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一个家庭无法养活孩子，他们就不会生育，因此，由于缺乏为他人工作并获得报酬的劳动力，雇佣劳动制度注定会从根本上崩溃。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再生产劳动还是家庭奴役？

从社会主义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反对家务劳动获得报酬，反对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这种反对的立场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同样坚定。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将总结要点。

我们已经指出，家庭主妇的地位与古罗马的奴隶非常相似。她们由主人供养、穿衣和照顾。因此，女性被束缚于丈夫的薪水和其至高无上的意志之下。马克思有一句与此相关的著名论断：“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恩格斯在其关于家庭起源的经典著作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并指出：

>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如今，像西尔维娅·费代里奇这样的前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社会科学在女性社会地位方面倒退 150 年；他们重新定义工人阶级家庭主妇，认为她们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整天忙于锅碗瓢盆、尿布、拖把和令人窒息的肥皂剧。

费代里奇声称：

> “要求为照护工作支付工资对女性来说确实是一种解放，因为它意味着女性明白她们所做的是一份工作：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费代里奇）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道德主义理论（“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怎么可能不是生产性的？！为什么只有男人的工作才有经济价值？！”），正如我们刚才解释的，这种理论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为家庭主妇在家中的“再生产劳动”（即家务劳动）支付报酬，同时维持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变，从而使家庭主妇的自由度也维持在之前的水平，这只会强化家庭主妇是负重牲畜的观念，认为她们背负着工人阶级家庭所承受的一切社会压力（包括心理和生理上的虐待）。这会让她远离社交生活，被囚禁在四面墙内，被繁重的家务活麻痹身心。这样一来，她就更容易被操控，以维护现状，而现状鼓励家庭主妇对丈夫和子女的政治、工会活动等持保守态度。

即使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女权运动者也明白这一点。值得称赞的是，她们当时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彻底谴责了对女性的家

庭奴役。尤其是在西班牙，由于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性，任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或左翼会议上倡导家务劳动工资的人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赶出去，而且理应如此。

不幸的是，如今女权运动和左翼阵营中涌现出一大批“理论家”，兜售这样一种观点：在家从事家务劳动是一种解放，资本主义却对此置之不理，必须为此付费，从而将家庭奴役伪装成国家补贴或资本家的补偿。

费代里奇和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观点的转变是有原因的。她们仍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标签，她们就会失去反建制的魅力，书籍销量也会下降，受邀参加的会议也会减少。但她们已经放弃了任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尝试，也放弃了在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转型的努力。她们伪装成“务实”和“现实主义者”，只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

她们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还体现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以下言论中：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做出战略决策时，女权运动彻底放弃了再生产领域，几乎完全专注于家庭以外的工作。其目标是通过劳动赢得平等。然而，男性在职场中也心怀不满，为了和他们一样心怀不满、遭受压迫而争取平等，根本算不上什么策略。”（引自此处）

费代里奇的提议是什么？家务劳动不好，但公司工作也不好。此外，我们还要在家里承担“第二班”工作，比如育儿、打扫卫生等等。所以，既然我们看不到其他选择，不如回到奴役我们的家庭，但我们要求获得报酬作为交换。

这就是像费代里奇这样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为数百万受压迫的贫困劳动女性所描绘的美好前景：然而，这种前景与费代里奇和其他持此倾向的女权主义者所处的现实世界却相去甚远——这一点我们确信无疑。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下的工作世界对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非人化和剥削性的。女性被迫在公司和家中“身兼两职”，这的确不假。当然，外出工作本身并不能使女性获得自由，但它确实给了她们摆脱伴侣束缚的机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家务劳动工资”是一种幻想，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危机和长期紧缩的背景下。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我们的替代方案是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诉求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是根除女性压迫的唯一途径，而不是满足于残羹剩饭、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提出不切实际甚至反动的要求。

家庭中的有偿劳动

护理行业的专业有偿劳动——照料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清洁房屋、准备食物等等——与家庭主妇在家中所做的工作性质截然不同。只有愚钝之人才会看不出其中的区别。

“护理”工作的有偿性质——借用自由派和左翼进步人士用来指代家务劳动和照料儿童老人的这个令人不快的委婉说法——给这些工作带来了质的社会变革。这当然是一项极其辛苦的工作，而且报酬仍然很低。然而，与普通家庭主妇不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对她们所做的工作并没有个人投入。这与她们无关。家庭主妇在家工作，而受雇的护理人员只是在家从事四、六或八小时的护理工作，并以此换取工资。没有工资，就没有工作。仅仅是离开家，掌控自己的社交生活——包括前往工作地点，与同行或其他领域的工人交流经验，或者被公司聘用从事此类工作，从而了解将她与其他公司员工联系在一起的共同阶级利益——就能帮助女性劳动者理解阶级社会的本质及其内部运作。

她能够加入工会，依法争取某些权利，理解为自身利益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等等，这些都能在受雇的“护理”人员的心理层面引入政治意识、自我价值感和自尊。这与被困在家中的普通家庭主妇所获得的体验截然不同。受雇劳动者所遭受的异化，与任何受雇劳动者所遭受的异化并无二致，无论他们是冶金工人、文员还是临时工：这是劳动者的异化，而非奴隶的异化。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家就是她的世界；而对于护理人员而言，她们的世界则在外部，在社会生活中，在捍卫自身作为劳动者以及成千上万与她们一样的人的利益的过程中。

将家务劳动、育儿和照护老人转化为有偿劳动，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最终使妇女和家庭摆脱家庭奴役创造了条件。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关键在于消除那些加重家庭负担的繁重家务（洗衣、做饭、照料儿童和老人）。除了在社区和工作场所配备完善的托儿所外，社会主义还将在每个社区建设儿童和青少年休闲娱乐中心，所有中心都将得到妥善照料，设施齐全，寓教于乐。养老院将不再是我们目前所见的阴暗、肮脏、管理不善且费用昂贵的场所，而是达到高档酒店的水平，免费或低价，并配备设施齐全的医疗设施。

该行业的工人无需忍受长时间、体力消耗巨大的轮班。他们的工作时间将只有四五个小时，甚至更短。我们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照顾残疾人、老年人或病人所需的体力劳动。所有技术都将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各项工作的劳动量，尤其是在那些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中。

正如恩格斯精辟地指出：

>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

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走向社会主义来摆脱家庭奴役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儿童抚养、老人照护和残疾人照护的社会化。整个社会将承担这些任务，使劳动家庭，特别是家庭主妇，从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已经通过公共管理体系或授予私人企业集团的许可（尽管只是部分且不充分地）实现了家庭和社区生活某些方面的社会化。这些方面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电信、电力、废物管理等等。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老人照护和残疾人照护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照护服务领域，也看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举措是有其局限性的。资本家们竭尽全力避免将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更多剩余价值（利润的来源）交给社会，用于资助家务劳动的普遍社会化。

鉴于此，家庭主妇是否应该领取工资以完全自立，独立于丈夫？当然应该，但这并非因为她是家庭主妇。她必须摆脱这种身份。我们要求所有失业者都应获得一份固定、体面且收入丰厚的工作，并在失业期间领取相当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救济金。因此，我们要求家庭主妇像失业者一样领取这些福利，但我们也要求所有人都能获得高质量、高薪的工作，并鼓励她们寻找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我们敦促他们拓宽视野，在家庭之外融入更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并积极参与其他工人为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进行的自觉斗争，其诉求如下：免费

公共托儿所、免费公共食堂、免费公共洗衣房，以及由有偿工人承担的“照护”工作。国家还必须为所有 18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食物和基本衣物。总之，我们希望减少或消除所谓的“家务”，这些家务以往都是家庭主妇的职责，让她们走出家门，成为经济上独立于伴侣的人。

我们必须向工人阶级，特别是家庭主妇们解释，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命脉转移到集体所有制并由工人民主管理，我们才能实现家务劳动的普遍社会化。

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

> “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因此，通过结合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进步——集体劳动，抑制一切人类活动中的逐利动机，真正地爱邻如己而不带宗教虚伪或私利——以及最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将彻底根除家庭奴役和妇女对男人的屈从，使妇女能够充分发挥其真正的潜能——而这正是阶级社会数千年来一直拒绝给予她的东西。





更多文章，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bolshevik.red/
月报订阅
bolsheviks.sub@proton.me
推特账号
@bolshevik_red
电报频道
https://t.me/bolshevik_red
投稿邮箱
bolsheviks.red@proton.me

列宁带着安详的微笑说:“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这里，在其他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无产阶级的妇女在革命时期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就不会胜利。或者几乎不会胜利。这是我的意见。她们那时多么勇敢，她们现在还是多么勇敢呵！想想她们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损失吧。她们仍在坚持下去，因为她们拥护苏维埃，因为她们要自由，要共产主义。是的，我们无产阶级的妇女是杰出的阶级战士。她们值得赞美和热爱。”

——克拉拉·蔡特金，《列宁印象记》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那种地位。…… 这里，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919年9月23日



布尔什维克

杂志第六期 2026.07

革命与女性解放：中国性别问题